
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绅士化特征研究

——以南京市江宁区龙乡·双范民宿村为例

徐菊芬¹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城市与土木工程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89)

【摘要】: 乡村振兴政策的大力实施推动了多元资本下乡参与乡村建设, 带动了人口由城市迁移至乡村的“逆城市化”现象。中西方乡村绅士化在发展动力、人口构成、社会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以南京市龙乡·双范民宿村为实证案例, 剖析乡村绅士化的过程、特征和动力机制, 认为旅游型乡村的绅士化是由资本下乡寻求增值、乡村闲暇消费需求、政府政策推动等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旅游产业 乡村 绅士化

【中图分类号】 F592.7 **【文献标识码】** A

学术界普遍认为“绅士化”一词最早由英国学者 GLASS 于 1964 年提出, 其表现为中产阶级由郊区新城搬迁到原本由于郊区化而衰败的内城, 这得益于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内城更新措施, 比如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公共空间改造使得内城变得更加宜居, 文化艺术的复兴创造了更为丰富的就业机会, 中产阶级的回迁形成了一定地域空间高收入阶级取代低收入阶级的现象, 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和景观的变化。随着城镇化及全球化的影响, “绅士化”的发展演变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变迁, 其中一个分支就是 1990 年提出的“乡村绅士化”, 其背景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逆城市化迅速发展, 大量的富裕阶层为了追求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而搬迁到乡村地区, 这也被称为“舒适移民”, 从而在乡村地区出现了阶层的置换或融合。

不同于国外土地私有、允许进行市场交易的土地政策, 我国的乡村土地为集体所有, 农民无偿取得的宅基地不能由个人在市场上自由交易, 因此没有出现类似西方大规模城市人口迁移到乡村居住的逆城市化, 但是近十年来, 随着国家对乡村建设的大力扶持, 乡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改革使得农村宅基地和经营性用地的使用权可以出让给第三方进行开发建设, 吸引了包括财政投资、工商资本在内的多元资本进入到乡村建设领域, 在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等政策的实施推动下, 乡村旅游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在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 一方面依然存在着大量乡村人口往城市集聚的现象, 另一方面, 在乡村振兴政策的引导下大量资本转移到乡建领域, 资本带动了包括乡村旅游在内的新经济的发展, 也在乡村创造了大量新就业岗位, 中国的“乡村绅士化”热潮已经拉开序幕。

1 “乡村绅士化”概念辨析及中西方比较

1.1 乡村绅士化的概念

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多个视角对“乡村绅士化”的内涵与动力机制进行了解释: 从表现来看, “乡村绅士化”是城市中产阶

作者简介: 徐菊芬(1982-), 女, 江苏苏州人,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乡村产业与规划、人居环境。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旅游驱动下的南京乡村空间重构特征与机制研究”, 批准号: 2020SJA2205)

级为了寻求更加舒适的居住和休闲空间而向乡村迁移的过程，导致乡村出现阶层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导致原住村民的搬迁从而发生阶级置换，也可能因乡村闲置住宅充足而出现迁入的新阶层与原住民共生的现象。从动力机制来看，空间生产理论认为乡村绅士化是资本在城市建设领域的投资过剩而导致利润空间受限，进而转向乡村建设领域寻求新的资产增值路径，从而推动了乡村人口、经济、土地等结构发生重构。

1.2 中西方乡村绅士化对比

1.2.1 发展动力差异。

西方的乡村绅士化多为社会因素驱动，即富裕阶层为了寻求更加舒适、安静、宽敞的生活环境而迁居乡村，特别是当家庭中有下一代出生，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加宽松自然的生活环境而迁居乡村是西方乡村绅士化的主要原因。中国的乡村绅士化则主要是经济因素驱动的，即伴随着工商资本下乡，在土地政策、产业政策等支持下，城市资本转入乡村进行新领域的投资，乡村地区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新雇佣关系带动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进入乡村。近年来，随着养老地产的大力发展，中国一些山水环境较好的乡村地区也出现了“舒适移民”现象，发达城市周边的乡村投资建设高端养生小区的现象屡见不鲜，并配套有完备的医疗和日常生活所需设施，吸引了具有一定经济条件的老年群体迁居乡村。

1.2.2 人口结构差异。

西方向乡村进行舒适性移民的人口多为具有一定财富积累并且已经有下一代的富裕阶层，移民的人口年龄普遍为中年群体且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迁居，如澳大利亚 Castlemaine 镇的乡村移民中，35 岁以上人口比例不断增加，而随着核心家庭一起发生迁移的，还有从事家政服务的人群，比如美国西部乡村的绅士化群体就包含了城市白人精英和为其服务的拉丁裔移民。而中国乡村绅士化的社会阶层可以相对清晰地归为三类：第一类为年轻的创业者或者受雇者，因资本转移和政策驱动前往乡村创业或就业，根据笔者在南京市江宁区多个乡村的实地调研，乡村旅游带动的精品民宿、乡村文旅等产业的从业人员大多为 35 岁以下的青年群体；第二类为返乡创业的村民，因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产业的兴起而选择回乡创业，属于原住村民通过“自我提升”实现收入增长和阶层跃迁的绅士化；第三类是迁居乡村的养老群体，因购买养老地产及相应的养老服务而前往乡村定居，属于相对独立的乡村消费群体。

1.2.3 社会关系差异。

西方国家的乡村土地为私人所有，外来居民迁居乡村主要以购买的方式获得土地和覆盖物业的永久使用权，以居所为主体的乡村投资方式使得乡村社会关系具有相对长期性和稳定性，并具备较好的投资价值；从职住关系来看，乡村移民栖居于乡村，而工作地点往往在城市，因此呈现出远距离的通勤特征。中国的乡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工商资本主要以租赁的方式签订一定期限（十年或二十年）的土地使用权，到期后仍然需要续租或由政府收回，企业或个人可以在使用期限内通过转租方式获得开发使用权，基于雇佣关系的乡村社会关系则更具灵活性和多变性；从职住关系来看，中国乡村绅士化以产业为主要动力，具有职住合一的特征。

2 旅游驱动下的南京市龙乡·双范民宿村绅士化

2.1 龙乡·双范的绅士化过程

龙乡·双范民宿村位于南京市江宁区西部乡村核心片区，是由上范、兴范两个村庄合并开发形成的美丽乡村试点。从区位来看，村庄距离黄龙岬、苏家文创小镇、晏湖驿站等网红村落的自驾车程均在 15 分钟左右，是江宁乡村环线的重要节点；从内部条件来看，村庄靠山面水，紧邻龙山水库，总体上具备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交通可达性。2014 年以前，在城镇化发展的背景

下，两个村庄因为人口外迁而出现了空心化现象，2014 年开始，村庄的闲置宅基地逐渐被政府收储，并将其作为西部美丽乡村环线上的一个驿站式节点进行活化改造，在江宁交通建设集团、江宁旅游产业集团两大国资平台的推动下，乡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得到完善，住宿餐饮等旅游服务项目逐渐兴起，并吸引了品牌餐饮、国学馆、陶笛馆、茶馆等特色文化体验项目入驻，至 2020 年 8 月，龙乡·双范精品民宿村已建成 18 栋民宿共 232 个房间，为南京市最具规模的精品民宿文化集群之一。

2.2 龙乡·双范的绅士化特征

从产业结构来看，龙乡·双范民宿村已经完成了乡村旅游产业的深度植入，以乡村休闲度假为支柱产业，村内的民宿价格不一、丰俭由人，既有为骑行的旅友服务的小型乡村驿站(约 300 元/晚)，也有定位轻奢亲子度假的高端酒店(约 1000 元/晚)。在精品民宿的基础上延伸出文化体验、亲子游学、健康养生等体验项目(见表 1)。陶笛馆的 W 老师告诉笔者，他们的音乐培训机构主要在城区，此处的乡村点主要用于寒暑假的陶笛培训和夏令营，每年暑假他们都会面向中小學生组织数期陶笛独立营，带领孩子们认识乡村植物蔬菜，学习陶笛演奏。

从资本构成来看，在国资平台的引导下，民营企业、电商平台、乡村创客等主体也参与到村庄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中，截止 2020 年 8 月，乡村引入社会资本总计 5000 万元左右(江宁旅游产业集团官网数据)，国资集团在村内设置了驻村游客服务中心负责乡村旅游的信息咨询、住宿预订等管理事务。

从人口结构来看，根据笔者走访调研，村庄除少量村民没有实施搬迁外，经营乡村休闲旅游产业的从业人员大多为 40 岁以下的青年群体，陶笛馆的 W 老师告诉笔者，这里有不少像她这样还没有小孩的年轻员工，问及后期的去留问题，她坦言，如果已经成家并且有了小孩，考虑到教育、就医等现实问题会向单位申请岗位调动。

表 1 龙乡·双范入驻业态

企业名称	类别	企业名称	类别
心宿	民宿	骑友驿站	驿站
大缘文化	民宿	乡贤馆	文化展览
牧场饭庄	民宿、餐饮、清吧	同心大茶馆	餐饮、文化宣传
临水三栋	民宿	兴范堂屋	游客服务中心
上范·龙园	民宿	陶笛馆	文化休闲
龙乡·溪谷	民宿	运动康复中心	康养
兴范龙园	民宿综合体	中医馆	康养
龙乡·缘居	民宿	易禅瑜伽馆	康养
燕窝	民宿	商量书房	文化休闲
旷济堂	民宿	露天广场活动中心	文化休闲
龙乡·贵园	民宿	牛牛的家	餐饮

2.3 龙乡·双范的绅士化机制

2.3.1 资本下乡寻求增值。

除了政府公共财政投资，以旅游产业为主导的乡村建设还吸引了大量工商资本的参与，其本质是资本在城市的投资增值空间受限，又在乡村振兴政策福利的引导下转而投向乡村建设的行为。为了吸引多元资本参与乡建，街道政府常常用低租金甚至零租金的方式出租民宅，在短期内往往可以取得明显成效，乡村的物质空间环境在短期内得到极大的提升，美丽乡村的样本快速被打造起来。龙乡·双范精品民宿村作为江宁区于2016年左右密集开发的众多美丽乡村试点之一，在2年不到的时间内完成了美丽乡村的初步建设，周边的苏家文创小镇、黄龙岷等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对外营业，资本向乡村转移的速度之快可见一斑。

2.3.2 闲暇消费需求高涨。

如果说土地制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的逆城市化进程，那么至少有一点是中西方城镇化发展的共同需求，就是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久居城市的居民对乡村田园生活的向往将日益强烈，这大概也可以理解为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更加向往自由、安静、宽敞、自然的休闲时光，来缓解城市快节奏生活的压力，一辆私家车外加一条“最美乡村公路”就能带领人们在周末及节假日暂时抽离城市。近两年受疫情影响，居民的旅游消费呈现出明显的近域化特征，位于南京大都市近郊区的龙乡·双范民宿村正是满足了城市白领阶层想要暂离都市喧嚣的消费需求。

2.3.3 政府大力推动乡建。

江宁交通建设集团、江宁旅游产业集团作为两大国资平台，是南京市江宁区实施乡村旅游开发的核心力量。在龙乡·双范民宿村的开发过程中，两大平台承担了乡村大部分公共基础设施和部分旅游经营项目的建设，在中后期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政府给予优惠的租金政策，并派出驻村管理机构负责乡村运营，在后期的运营维护中，政府依然承担着村庄公共景观的维护和更新，可以说提供了全程参与的“保姆式”服务，这也给公共财政造成了较大的负担。

3 结论与讨论

尽管中西方在乡村绅士化的动因、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中国的乡村已经迎来了转型提升的新时代，三大产业融合发展，乡村面貌在短期得到极大的改观。可以肯定的是，乡村旅游作为推动乡村绅士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大大促进了乡村产业的转型升级，并深刻影响了乡村社会关系。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以精品民宿、亲子研学、乡村观光体验、健康养生等形式为主的乡村也许能为城市居民周末度假带来星级酒店的服务，但是面向“新村民”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公共设施总体比较缺乏，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乡村绅士化又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当前我国的乡村振兴重点关注土地、产业等方面的政策改革，但缺乏对新“乡村绅士”阶层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关注，这也是未来留住乡村人才、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需要考虑的另一个课题。

参考文献：

- [1] 宋伟轩. 西方城市绅士化理论纷争及启示[J]. 人文地理, 2013, 33(1):32-36.
- [2] Glass R. London: Aspects of Change[M]. London: MacGibbon and Kee, 1964.
- [3] 卢松, 张海, 饶小芳. 西方乡村绅士化研究进展[J]. 人文地理, 2019, 34(3):1-6.

-
- [4]Yang J, Eddie C, Lang W, et al. Ownership, rent-seeking, and rural gentrification:Reconstructing villages for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n China[J].Sustainability, 2018, 10(6):1997-2014.
- [5]张京祥, 姜克芳. 解析中国当前乡建热潮背后的资本逻辑[J]. 现代城市研究, 2016(10):2-8.
- [6]张娟, 王茂军. 乡村绅士化进程中旅游型村落生活空间重塑特征研究: 以北京爨底下村为例[J]. 人文地理, 2017, 32(2):137-144.
- [7]何深静, 钱俊希, 徐雨璇, 等.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时空演变特征[J]. 地理学报, 2012, 67(8):1044-1056.
- [8]Cloke P, Phillips M, Thrift N. The new middle class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ural living[M]. Butler T, Savage M. (Eds.). So-cial Change and the Middle Classes. London:UCL Press, 1995:220-240.
- [9]方园, 刘声, 祝立雄, 等. 多维生态位视角下的乡村养老特色村研究——以浙江西北部为例[J]. 经济地理, 2019, 39(8):160-167.
- [10]谭华云, 许春晓. 舒适移民型乡村绅士化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以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为例[J]. 旅游学刊, 2021, 36(2):40-53.
- [11]Nelson P B, Oberg A, Nelson L. Rural gentrification and linked 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0(26):343-352.
- [12]关晶, 张朝枝. 民宿业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特征与驱动机制——莫干山镇案例研究[J]. 旅游论坛, 2020, 13(2): 81-93.
- [13]申明锐. 从乡村建设到乡村运营—政府项目市场托管的成效与困境[J]. 城市规划, 2020, 44(7): 9-17.